

土耳其正发党与繁荣党的差异比较研究

敏 敬

内容提要 土耳其繁荣党和正发党是明显亲伊斯兰的政党，但两党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意见相左。繁荣党有明显的政治宗教化倾向，正发党则坚持温和世俗主义基础上的政教分离原则；繁荣党在政治上实行专断，正发党则提倡民主宽容；繁荣党否认西方文化，反对欧盟，正发党则肯定欧盟的进步价值，在土耳其争取加入欧盟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繁荣党未能改变土耳其经济的总体形势，正发党则引导土耳其经济摆脱危机，实行健康发展。上述差异是促使繁荣党被取缔和正发党连续执政的决定性因素，并可能对未来的土耳其政教关系和中东原教旨主义思潮产生积极影响。

关键词 正发党 繁荣党 伊斯兰主义 欧盟 世俗主义

作者简介 敏敬，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兰州 730020）。

2007年7月22日，土耳其议会选举揭晓，向来被认为有浓厚伊斯兰背景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下称“正发党”）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这是该党继2002年后再次获得执政机会。8月28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进行第三轮总统选举表决，结果是，正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第59届政府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居尔当选，并随后宣誓就任土耳其共和国第11届总统。与此同时，代表土耳其世俗主义强硬派的军队表示将坚决捍卫世俗体制，¹土耳其媒体认为，这是直接针对居尔和正发党。军方态度使土耳其的世俗、伊斯兰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对正发党顺利执政的原因、正发党的未来命运，以及该党执政对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关系的影响发表了不同看法。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正发党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繁荣党在一些关键领域的主张和实践进行比较。

正发党与繁荣党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正发党现任主席埃尔多安曾是繁荣党的骨干成员。1998年繁荣党被取缔，其成员迅速重组为美德党，继续坚持繁荣党的基本政策和主张，显现出明显的伊斯兰主义特征。但同时，美德党内以埃尔多安为首的年轻党员要求以亲伊斯兰立场取代伊斯兰主义立场的呼声也日渐高涨。2001年，美德党被取缔。同年7月，党内保守派进行重组，成立幸福党；8月，埃尔多安领导年轻的改革派组成正发党。两党为参加2002年全国大选做积极准备。大选结果，幸福党只赢得2.5%的选票，正发党以362票当选议会第一大党，组成共和国历史上少见的一党政府。正发党与繁荣党在人员和组织上的前后联系，以及两党推崇伊斯兰教及其价值的共同特征，成为反对派指控正发党鼓吹原教旨主义、威胁世俗体制的主要原因。但通过比较发现，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政治风格、对待欧盟政策和经济建设等重要领域，正发党的立场和实践均与繁荣党有重大差异（由于美德党和幸福党存续时间短，

¹ 2007年8月27日，即居尔当选总统前一天，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比于卡内特强调，军队将一如既往地坚决维护共和国世俗和民主制，决不会作出任何让步。军方和议会第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都没有出席居尔就任总统的宣誓仪式。（参见李玉东：《土耳其新总统道路不平坦》，载《光明日报》，2007年8月31日），这说明世俗主义阵营对正发党的怀疑仍无根本改变。

且其主张与繁荣党基本一致，故在比较时予以省略)。这些差异为正发党立足世俗体制的土耳其政坛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考察未来土耳其政教关系发展趋势和正发党命运的关键所在。

宗教：政治工具，还是个人事务？

繁荣党在其前身救国党时期就被视为原教旨主义政治势力而受到土耳其世俗主义阵营关注。繁荣党的最显著特征是主张政治宗教化和宗教政治化，主张利用宗教解决现实问题，建设伊斯兰教的理想社会。¹ 繁荣党以道德和文化的眼光认为，土耳其的落后主要是因为受了西方文化的不良影响。该党指责奥斯曼帝国后期的坦齐马特改革（1839~1876年）抛弃伊斯兰教，引入西方物质主义、无神论等文化糟粕，导致土耳其穆斯林长期遭受西方文化和政治的双重奴役。该党并历数西方式现代化给土耳其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病，如享乐主义盛行、人际关系冷漠、红灯区泛滥、社会欺诈和投机现象普遍、贫富差距悬殊、弱势群体缺少保护、传统美德遭到破坏等。繁荣党号召以土耳其传统文化为基础，重新确认土耳其的民族文化和精神认同，走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发展道路；强调伊斯兰教在“探讨社会认同和正义的道德框架”时的地位和作用，^④ 主张通过发展社会道德来彻底剔除西化主义的影响，根治社会弊病。繁荣党明确提出国家必须负起责任，号召借助国家权力推行伊斯兰化，全面推动社会道德的重建与发展。该党相信，只有发展社会道德才能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最终建成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提高土耳其的国际地位，使土耳其担负起引导穆斯林世界复兴，共同对抗西方霸权的重任。繁荣党声称，其政治作用就是要填补土耳其西化政策所导致的道德和文化真空，^(四) 号召选民支持繁荣党的政治事业，并解释说支持繁荣党就是支持伊斯兰教，就会获得今后两世的裨益。

繁荣党将宗教与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宗教不但是该党争取社会支持的宣传工具和重要决策依据，而且被视为国家的重要职能领域。繁荣党视世俗主义为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认为现行世俗主义限制宗教自由，阻碍社会道德进步。它强烈抨击土耳其的西化精英和世俗主义者，称他们与西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利用国家机器和手中的权力压制穆斯林的宗教要求。繁荣党的这些主张与共和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发生明显冲突，被土耳其军方和世俗政党认定为原教旨主义政治势力。同时，繁荣党为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而不时改变策略，甚至不惜放弃原有立场，更加深了人们对它滥用宗教从事政治的看法。² 总之，繁荣党的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言行引起世俗主义阵营的警惕与强烈不满，导致繁荣党政府于1997年被迫辞职，繁荣党自身随后被判决取缔。

与繁荣党公然以宗教作为政治旗帜相比，正发党则十分注意保持与宗教的距离，并明确划清了政党与宗教的界限，反对利用宗教从事政治。埃尔多安认为，政治宗教化是热衷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冷战思维的表现，易导致政党走向偏激、排外等。他说：“让宗教为政治服务，以宗教为工具，并以宗教名义排斥异己，不仅危害社会和平、政治多元，而且危害宗教自身。”埃尔多安还认为，土耳其已处于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最显著特征是鼓励参与、拒绝歧视、重视协作与政治多元，注重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不受侵犯。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宗教搞意识形态政治明显与时代精神不符。因此正发党宣称，本党坚持非意识形态、非伊斯兰主义的政治道路，党的宗旨是服务大众，而不是仅仅关注宗教问题和宗教人群。当然，作为亲伊斯兰政党，正发党并不否认对伊斯兰教及其价值的推崇，包括埃

¹ See Ahmet Yildiz “Politico-Religious Discourse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The Parties of National Outlook” *Muslim World*, 93 (2), 2003, pp. 189-195.

^④ See M. Hakan Yavuz and John L. Esposito eds., *Turkish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The Gülen Movement*,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4.

^(四) See Sencer Ayata “The Rise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nd Its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tilla Eratp, Muharrem Tany, and Birol Yeilada (eds.), *The Political and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urkey*,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1993, p. 62.

² See Hakan Yavuz “Political Islam and the Welfare (Refah) Party in Turkey,” *Comparative Politics*, 30, (1), 1997, p. 75.

尔多安和居尔在内的很多正发党成员都以宗教虔诚而著称。但他们表示,将严守凯末尔关于宗教限于私人领域的遗训,尊重个人信仰与政治的界限。埃尔多安的许多讲话一面表示支持伊斯兰教可以作为政治家个人的生活指南,另一面又否认正发党以伊斯兰教作为指导思想,并对社会上有意混淆宗教与政治关系和不利于正发党的种种猜测提出谴责,¹表示正发党将在遵守宪法和共和制各项原则的前提下坚持宗教信仰。^④正发党的表态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可,人们注意到在正发党内,伊斯兰教是用来增强党的凝聚力,激发党员的工作热情。^④

对于现行世俗制度,正发党和繁荣党都认为它过于苛刻,过多干预宗教内部事务,有歧视信众、违背政教分离之嫌。但正发党反对采取繁荣党式的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来解决问题,主张应重新定义世俗主义,使其朝着有利于民主自由,有利于政党之间团结、协商的方向发展。换言之,正发党并不反对世俗主义本身,反对的只是在世俗主义名义下对多元文化、自由主义和社会自主的压制。正发党称这是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它认为,土耳其面临的问题不是选择伊斯兰教或选择西方,选择世俗精英还是选择信众,而是选择现代化理念。传统的土耳其世俗主义把现代化视为一场文化转型运动,主张通过国家权力实现文化的强制转型,因此赋予国家太大权力,而忽视了社会力量对现代化的参与,导致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活和官僚主义盛行。这种旧的国家-社会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充分暴露出它的弊端,成为禁锢社会活力,妨碍经济和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消极因素。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实现权力的重新分配,改变自上而下式的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结构,激发社会的创造潜力,其中包括放弃对伊斯兰教和信众的歧视态度。归根结底,正发党把对社会保持高度信任视为自己与凯末尔世俗主义的最大区别,^{1/4}并以此显示自己的非意识形态主张正是出于对社会自主能力的重视和尊重。埃尔多安也多次向公众保证,正发党不会将伊斯兰教及其价值强加于全体社会,正发党的追求只是展示虔诚信教之人如何成功地从事政治,领导国家和民族走向繁荣。

综上所述,正发党对宗教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两点:(1)承认信仰宗教并尊崇伊斯兰教价值,但反对将其强加于全体社会,反对利用宗教进行政治鼓动,压制社会多元文化。(2)拥护世俗主义,但要求扩大宗教自由,允许选民自由表达宗教认同。正发党的这些主张使该党能够做到尽量避免过度抨击世俗主义,而重点关注全体人民的各种不同要求,摆脱单纯强调宗教问题的狭隘视野。

在专制与民主之间抉择

政治观的差异使繁荣党和正发党形成不同的政治风格,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影响。繁荣党坚信自己代表绝对真理,表现在政治方面便是对自己不感兴趣的社会呼声缺乏重视。首先,繁荣党大搞党内集权,埃爾巴坎和少数几个人组成的政治局垄断党的决策,以巩固“团结”为名,反对任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内形成森严的等级结构。繁荣党对此解释为:“我们的文化中没有批评的空间。如果一个人缺乏干好事的能力,就必须帮助有能力的人干好事。”因此,党的意志实际是少数党的领导干部的意志,与党的基层成员始终存在一定距离,甚至某种程度的对立。其次,在国家层面,繁荣党倾向于支持保守的权力结构,主张利用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地推广道德发展计划,这使该党的主张看起来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它一方面批评世俗主义控制宗教,限制宗教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自身又积极通过控制宗教来扩大影响。这实际上体现了繁荣党对社会的极度不信任思想。繁荣党认为,除其成员及支持者之外的土耳其社会已陷入思想迷误,并轻蔑地称那些远离伊斯兰道德的人为“迪斯科男孩”,

¹ See Metin Heper and Ule Toktas, “Islam, Modernity, and Democracy in Contemporary Turkey: The Case of Recep Tayyip Erdoğan”, *The Muslim World*, Vol. 93, April 2003, p. 171.

^④ See Metin Heper and Ule Toktas, op. cit., p. 177.

^④ See Ahmet Yildiz, op. cit., p. 194.

^{1/4} See Menderes Cinar, “Turkey’s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AKP Rule”, *The Muslim World*, Vol. 96, July 2006, p. 476.

宣称拯救他们，帮他们脱离道德危机或思想迷误是本党的神圣职责，而那些帮助和支持繁荣党的人，将获得后世丰厚的报偿。繁荣党以此为自己自上而下控制社会的做法披上神圣的外衣。

繁荣党的政治专断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在党内导致分裂，形成不满埃尔巴坎家长制作风的少壮派与以埃尔巴坎为首的元老派的对抗局面，削弱了党的力量。在党外，繁荣党和支持自己的选民同大部分社会成员不断发生冲突，影响党的支持率保持稳定；世俗主义反对派更是认为与伊斯兰主义做斗争就是保护民主。

正发党扭转了繁荣党的上述做法。首先，放弃繁荣党的绝对主义论调，拒绝为政治预设一个神圣前提和使命的做法，强调党必须为全体社会服务，否认宗教利益代表全体社会的利益。其次，强调以尊重民主而非宗教作为党的首要议题，主张通过民主解决分歧。埃尔多安称民主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思想的交流和最大程度的协商。¹ 居尔则认为，保守、现代、民主三者相加是正发党吸引选民的最主要因素。正是基于对民主的尊重，正发党否认政治上存在不容谈判的绝对真理，认为政治生活必须坚持对话、妥协和法治的原则。正发党尊重全体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原因之一是它清醒地认识到了军方的意志、权威，以及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并对自己在政治上一意孤行可能带来的风险做了充分估计。但它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却是十分积极的，那就是正发党时刻注意吸收来自社会各层面的信息和不同意见，尤其注意在重大问题上通过协调、温和的方法与世俗主义阵营达成共识，减少政治阻力。它大量吸收祖国党、共和人民党等反对党成员参与政府的工作，尽量体现民主精神和对世俗主义者的善意，避免被人指责为专制、排外。2005年，议会表决有关取消禁止女性在学校佩戴头巾问题的提案。正发党虽然支持该提案，但经过对其他党派意见的了解和分析，最终还是投了反对票。这种温和与协商的立场，显示出正发党的包容精神，有助于正发党化解反对派的疑虑，赢得社会各界的信任，巩固已有的政治地位。比起党外的协商民主，正发党在党内仍保留有浓重的集权色彩，埃尔多安和埃尔巴坎一样，剥夺党员和国会议员的自主权，把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但这样做的动机与繁荣党有所不同：繁荣党搞党内集权旨在扩大宗教对政治的影响，贯彻繁荣党的道德主张；正发党集权则是防止党的基层成员提出过激的宗教性要求，以使本党非意识形态、非伊斯兰主义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避免给反对派造成口实。这种把民主与集权集于一身的现象是土耳其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产物，从一个侧面说明正发党维护现行政教分离体制、尊重社会多元文化需求的决心。

欧盟：敌人，还是朋友？

在土耳其，如何对待欧盟与西方，不仅是文化和价值观的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是否拥护加入欧盟，向来被世俗阵营视为检验是否忠于世俗主义和西化主义的试金石。在此问题上，繁荣党和正发党的认识角度及得出的结论均有所不同。

繁荣党认为，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是本质不同的两种文明，西方文明鼓吹世俗主义、物质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破坏穆斯林的社会道德，阻碍土耳其的进步和全面发展，因此，必须反对西方文明，反对盲目模仿西方和搞西化。繁荣党担心加入欧盟会使土耳其沦为西方的奴隶，丧失土耳其的文化和民族个性，主张土耳其放弃追求加入欧盟。繁荣党还进而反对全球化，谴责全球化是威胁土耳其穆斯林根本利益的西方帝国主义阴谋。繁荣党政府积极发展与伊朗等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被认为是其反西方和反欧盟主张的具体体现。

正发党执政时期彻底改变了繁荣党对欧盟和全球化的消极态度。根据2004年7月发表的一份全国性调查结果，在所有保守民族主义社会人群中，正发党的支持者是最不反对欧盟的。正发党充分肯定欧盟的文化价值，认为欧盟是文明的结晶，是经济繁荣、权利与自由（包括在学校佩戴头巾的权

¹ See Metin Heper and Ule Tokta, *op. cit.*, p. 169.

利) 这两大文明特征的集中体现。正发党还反对把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帝国主义, 认为全球化并不是静态的, 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政治过程, 土耳其应积极适应全球化, 并藉此加快与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埃尔多安上任伊始, 就把争取加入欧盟列为总理任期的首要目标; 正发党政府比历届政府更积极开展与欧盟的入盟谈判。经过艰苦努力, 欧盟终于在 2005 年 10 月 4 日通过决议, 承认土耳其的欧盟成员国候选国地位。土耳其漫长的入盟进程至此有了重大突破, 极大地鼓舞了土耳其人的民族自信。

繁荣党与正发党的欧盟政策反映出两党各自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政治思想的巨大差异, 且带来不同的政治后果。繁荣党反对并疏远与欧盟的关系, 不仅违背欧盟是土耳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一经济现实, 而且为反对派提供了反西化、反世俗主义的“确凿证据”, 加重了社会大多数成员和军方的不满。而正发党虽然仍背负伊斯兰主义的嫌疑, 但其明显的亲欧盟立场却使反对派找不到把柄。不仅如此, 正发党还利用争取入盟的契机, 在国内引入各项民主化改革措施。比如, 依照哥本哈根标准, 保护少数民族权利, 允许公共广播使用库尔德语和在私立学校教授库尔德语; 改革落后的教育、行政体制; 改革军方主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与构成, 扩大文官政府的决策权限, 逐步解决军人干政问题; 对外, 改变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传统立场, 积极响应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制定的统一全岛的计划。正发党的上述政策使该党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 对外赢得了欧盟的支持与好评, 对内则响应土耳其社会的民主化要求, 不仅有力淡化了本党的伊斯兰主义色彩, 而且将自身描绘成凯末尔主义“追赶当代文明水平”事业的真正继承者, 为避免与反对派和军方发生直接冲突奠定基础。可以说, 欧盟作为一支中间力量, 有效地起到了平衡正发党与反对派的关系、保护正发党的积极作用。

关于“面包”的承诺与兑现

决定正发党和繁荣党各自政治命运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两党各自的经济业绩。在繁荣党上台之前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土耳其贫富分化、通货膨胀现象十分严重, 失业率居高不下。^① 繁荣党向选民许诺要努力改变这一状况。繁荣党上台后所控制的一些地方政府率先行动, 而且政绩斐然, 赢得人们广泛赞誉。^② 像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政府在改善低收入居民家庭生活和加强公共设施建设方面成效显著。^③ 但总的来看, 在繁荣党任期内, 土耳其经济形势并没有明显好转, 其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 繁荣党执政时间较短, 从 1995 年 12 月选举上台到 1997 年被迫下台, 中间只有不到两年时间, 原定的很多经济计划来不及实施。其次, 繁荣党与正确道路党等世俗右翼保守政党组成联合内阁, 政治上受到牵制, 各项决策难以达成一致, 政策缺乏效力。最后, 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与繁荣党自身有关。繁荣党的意识形态思维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 而且渗透到经济领域, 主要表现为用道德批判代替物质批判, 工作重点不是放在制定系统有效的经济措施上, 而是放在与世俗主义阵营斗争、巩固自身政治地位方面, 致使繁荣党的经济计划大多脱离现实。总之, 繁荣党政府在经济领域表现欠佳, 导致该党在最主要的问题上丧失人们的信任。

在繁荣党下台后, 土耳其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至正发党上台之前已达到十分严峻的地步。2000 年底至 2001 年初, 长期积聚的各种矛盾加上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 使土耳其爆发了史无前例、几乎波及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金融危机: 银行发生大规模的挤兑, 金融机构、包括政府短时间内现金奇

^① See Haldun Gökçin, "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al Islam: the Social base of Turkey's Welfare Party", *Int. Middle East Stud.* 33 (2001), p. 441.

^② See Hüge Poulton, *The Grey Wolf and Crescent: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1997, p. 192.

^③ See Mehri Karpava, "Pseudo-Democratic Politics and Populist Possibilities: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urkey's Refah Party",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998), 25 (2), p. 299.

缺，银行间拆借利率一夜之间上升 30%，股市暴跌，货币迅速贬值。¹ 危机造成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失业人口剧增，普通百姓生活状况严重恶化。美国学者亨利·刘认为，这场危机“是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失误而造成的，即使是美国采用这种政策，也难以承受。”^④ 这种局面带来严峻挑战，加重了正发党上台执政的难度。在竞选宣传中，正发党着重强调改善人们的经济生活，而不是过多强调社会的道德危机。上台后，正发党进而制定详细的经济计划，着力缓解经济危机，主要包括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推行金融机构改革、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努力推进私有化进程，以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摆脱危机困扰为突破口。2002 年 11 月，正发党公布了一揽子施政方案，宣布将向受 2001 年 2 月金融危机冲击的 40 万家小企业提供 12 亿美元贷款，帮他们重新营业；承诺为市民提供便宜的电价和水费，减少税收，减轻农民的债务负担，为他们供应廉价燃料；计划加强全国主干道和基础设施建设，惩治腐败，消除贫困等。^④ 上述政策实施不久即获得显著效果，帮助正发党更加赢得民心，使该党在一年多后的全国地方选举中再创佳绩，以 42% 的得票率打破选举记录，获得全国 81 个城市中包括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和首都安卡拉在内的 57 个市长职位。总理埃尔多安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土耳其人民再次投了稳定、正义和发展一票。^{1/4} 至 2007 年全国大选前，不到 5 年时间，正发党引领土耳其经济不但走出持续低迷的状态，还实现了年均经济增长率 7% 的历史最高水平。通货膨胀率也被稳稳地控制在 10% 以内，达到近 30 年以来的最低点。^{1/2}

正发党取得良好的经济成就，其成功之道如下：（1）选择了正确的经济改革方向，特别是使中小企业树立起发展经济的信心，改善了国营企业和金融业的不良运行；（2）正发党控制议会多数并单独组阁，实现了土耳其数十年来罕见的议行合一，提高了决策效率；（3）繁荣党之后的几届政府经济表现差强人意，军方对保护世俗主义的重视高于对经济改革的重视，引起人们不满。人们普遍寄希望于正发党“面包加民主”、物质利益优先的改革主张，从而为正发党放手从事经济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显著的经济成就成为正发党最大的政治资本，使该党不仅赢得了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而且减少了反对派施加的压力，缓解了政治紧张气氛。例如，“当有人说正发党政府的怪话时，前总统德米雷尔居然一反批评政府的常态说：虽然各界政府都制定过很多宏伟目标，包括拿掉里拉的 6 个零，但成事的却只有正发党！在这点上不服不行。”^{3/4} 类似看法构成一股强大民意，有效地阻止了以军队为首的强硬派对正发党横加干预，使正发党得以免遭被繁荣党推翻和取缔的厄运。

结 语

对正发党与繁荣党的各种差异，有人认可，亦有人反对。反对者认为，这不过是伊斯兰主义的一种策略伪装，正发党根本上并没有改变利用宗教干预政治的企图。他们用“伊斯兰主义者始终是伊斯兰主义者”这句话，继续表示对正发党的怀疑和不信任。但支持者认为，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确实已发生明显改变，正发党的非意识形态、亲民主、亲欧盟的政治立场，表明了伊斯兰主义愿同世俗主义和民主实现对话与和解的诚意。持这一看法的主要是土耳其企业界、自由派知识分子、虔诚的穆斯

¹ 参阅巩新红：《金融危机何以降临土耳其》，载《西亚非洲》，2001 年第 6 期，第 33~36 页；张胤鸿：《土耳其频发金融危机》，载《瞭望新闻周刊》，2001 年第 12 期，第 61 页。

^④ [美国]亨利·刘著；颜剑英、刘卿摘译：《土耳其金融危机的教训》，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 年第 4 期，第 24 页。

^④ See *The Middle East*, December 2002, p. 9.

^{1/4} 参见新华网 2004 年 3 月 29 日。

^{1/2} 莫志伟：《土耳其执政党再次赢得大选》，载《工人日报》，2007 年 7 月 24 日。

^{3/4} 梁文洮著：《揭开土耳其的面纱》，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01 页。此处“拿掉里拉的 6 个零”是指经济改善使土耳其有条件实行货币改革，正发党政府新发行的土耳其里拉一举去掉了面值后面的 6 个零。——笔者

林和大部分社会弱势群体。不管哪一种看法，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作为明显亲伊斯兰的政党，正发党通过调适政策和观念，已成功跻身于土耳其政治主流，并连续两届执政。这种调整不仅决定了正发党的政治命运不同于繁荣党，而且对土耳其的各方面生活，尤其是政治领域产生深远影响。首先，使世俗阵营与伊斯兰主义的关系总体趋向缓和。正发党执政期间，军方和世俗主义强硬派依旧对正发党多次发出警告，但都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说明两者关系已不如繁荣党执政时期那样紧张。这既是凯末尔主义对社会的控制逐步放松的结果，^①也是正发党努力进行政策调适的结果。这种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相互克制的关系如果能够维系较长时间，有可能使二者在坚持政教分离的前提下，达到一种新的、比较和谐的关系状态。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耳其的社会变化要求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心随之而变化。^②正发党顺应这一趋势，提倡求同存异，重点发展经济，设法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这种政策重心的转变有助于团结不同社会群体，凝聚民族精神，共同面向未来。再次，正发党按欧盟提出的标准进行改革，掀起建国以来的第二轮改革浪潮。这些被欧盟官员誉为“阿塔图尔克建立共和国以来的二次革命”的改革，^③有利于土耳其摆脱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空泛争论，适应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趋势，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经济，拓展政治空间。最后，从整个中东地区来看，90年代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呈现逐渐消退的趋势；在土耳其，则表现为繁荣党势力的衰落。正发党的政策调整使人们看到原教旨主义的自我转化趋势，它有可能会对中东原教旨主义产生示范效应，使中东原教旨主义朝着温和而不激进、和解而不对立、民主而不专断、现实而非空想的方向逐步演进。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See Aglar Keyder “Whither the Project of Modernity” in *Rethinking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urkey*, Şibel Bozdoğan and Resat Kasaba eds. Seattle: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② See Cengiz Andar “Redefining Turkey’s Political Center” *Journal of Democracy*, 10 (4), 1999, p. 136.

^③ See Menderes Cinar, op. cit., p. 470.

• 资料库 •

实行双向匿名审稿的启事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名刊建设”工程的有关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期刊的学术水平和质量，《西亚非洲》编辑部从2009年7月起，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其基本程序如下：

1. 编辑部对来稿进行编号登记，然后由责任编辑根据来稿性质、栏目需求，以及稿件的规范情况等具体要求进行初审，筛选出被审阅文章，交由编辑部主任初审，确定通过初审的稿件；编辑部根据稿件的情况将稿件和《审稿意见书》交给审稿专家。
2. 审稿专家审阅稿件，填写《审稿意见书》，并在一定时间内将《审稿意见书》返回编辑部。
3. 编辑部将参考专家审阅意见和责任编辑的初审意见决定稿件修改与否。编辑部将《审稿意见书》及《作者答辩书》发给作者，以便进一步修改稿件。作者须按规定时间返回修改稿，否则，将被视为对发表权的自动放弃。
4. 责任编辑和编辑部主任依次对修改稿进行审阅，并对拟采用的稿件按本刊要求进行全方位加工。经复审加工后的稿件交由主编或有关副主编决审。经决审同意采用的稿件将择期在本刊发表。

为配合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请作者在投稿时将文章篇名、基金项目、作者简介、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子信箱、联系电话等全部放在与正文内容相独立的首页；正文不得显示与作者相关的任何信息。否则，稿件将被延后处理。

对于本刊双向匿名审稿制度的实施，恳请作者和读者提出宝贵的建议与意见，以便我们今后改进此项工作。

本刊编辑部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nd the Welfare Party in Turkey

Min Jing

pp. 26– 32

Although both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 and the Welfare Party (RP) in Turkey are pro-Islamic, the two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a series of key issues. The RP shows an obvious religious attitude while the AKP sticks to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on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based on moderate secularism. The RP is of political arbitrariness while the AKP is of democratic tolerance. The RP denies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resists the European Union (EU) while the AKP recognizes the progres-

sive value of the EU and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striving for Turkey's entry into the EU. The RP did not improve the Turkish economic situation while the AKP led Turkey ou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have made Turkish economy develop healthily. All the differences above have been the decisive factors that result in the RP's being banned and the AKP's successive ruling position, and will impact positively the future Turkish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the Middle East fundamentalism.

A Probe into Turkey– Iran Relation in the New Century

Zhang Laiyi

pp. 39– 43

There are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and good realistic conditions for Turkey and Iran to develop their relations, b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have long been cold. However, the issues of Iraq, energy factors and nuclear issue of Iran have all influenced positively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shared interests in tackling the Kurd issue have got the two close each other. The demand for energy has made Turkey ignore the U.S. opposition. It is appreciated by Iran

that Turkey has stood against the U.S. military attack in solving the Iran nuclear issue. The approach of the two state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terest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beneficial to the regional stability, yet the U.S. interference has long been the negative element that affecting Turkey– Iran relation development. There are still much work for the two to do in establishing new economic relation mechanism and cooperative principles.

An Analysis of the Government Roles in African Poverty Reduction

An Chunying

pp. 44– 49

The universal regional and long-term features of African poverty and the character for governments to control public resources have endowed the African governments with dominant and decisive roles in 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It is shown that the governments have brought poverty reduction into their relativ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y using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and ruling resources, which has laid the systematic basis of poverty reduction, having formed the substantial economic basis by adjusting financial expenses, credit funding and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poverty reduction, offering more opportunities to the poor to participate i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increase their incomes by implementing the policies of land reform and promoting small-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carrying out the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special poverty reduction programs. However, the governments may be restricted in many areas of poverty reduction. They need to well deal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NGOs and the people in poverty.